

教育研究论丛

【第四辑】

教育研究论丛

Educational-Studies Book Series

【第四辑】 戚万学 主编

教育哲学研究

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批判 高 伟

何以为学？何以为教？ 黄庆丽

以体制机制创新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曾天山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 李长伟

道德教育研究

道德教育中制度供给过剩及其补救路径 冯永刚

论海德格尔的教育伦理思想 刘 通

高等教育研究

困境与突围：我国通识教育师资问题初探 孙秀玲

教育科研质量标准：总体框架与内涵表达 刘贵华 柳劲松

基础教育与教师发展研究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版)修订的背景、原则及其特点 田慧生

教研组重建——培育中国特色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 单志艳

教科书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 张雨强 郭 敏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学科主办

教育研究论丛

Educational-Studies Book Series

【第四辑】 戚万学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教育研究论丛. 第4辑/戚万学主编.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209 - 09015 - 5

I. ①教… II. ①戚… III. ①教育 - 文集 IV.

①G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2005 号

教育研究论丛. 第4辑

戚万学 主编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0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9015 - 5

定 价 19.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教育研究论丛》学术委员会

学术顾问

鲁 洁	南京师范大学
陆有铨	华东师范大学
卢乃桂	香港中文大学

学术委员

(以姓名笔画为序)

于天龙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
石中英	北京师范大学
刘国强	香港中文大学
李 鹰	山东师范大学
孟繁华	首都师范大学
赵承福	山东师范大学
赵昌木	山东师范大学
唐汉卫	山东师范大学
涂艳国	华中师范大学
徐继存	山东师范大学
柳海民	东北师范大学
戚万学	山东师范大学
扈中平	华南师范大学
靳玉乐	西南大学

目 录

教育哲学研究

- ◆ 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批判 高 伟/1
- ◆ 何以为学？何以为教？ 黄庆丽/21
- ◆ 以体制机制创新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曾天山/31
- ◆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 李长伟/50

道德教育研究

- ◆ 道德教育中制度供给过剩及其补救路径 冯永刚/70
- ◆ 论海德格尔的教育伦理思想 刘 通/81

高等教育研究

- ◆ 困境与突围：我国通识教育师资问题初探 孙秀玲/97
- ◆ 教育科研质量标准：总体框架与内涵表达 刘贵华 柳劲松/104

基础教育与教师发展研究

- ◆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版）修订的
背景、原则及其特点 田慧生/118
- ◆ 教研组重建——培育中国特色教师专业
学习共同体 单志艳/129
- ◆ 教科书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 张雨强 郭 敏/138

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批判

高 伟^{*}

摘 要：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批判具有对现代教育进行全面整理与反思的特征。现代犬儒主义既是现代教育哲学问题之所在，也是现代教育哲学危机之表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比虚无主义更极端、更普遍的时代病症。现代犬儒主义不仅是哲学的犬儒化，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体制化的犬儒化。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实践话语，它产生了一种既无能量，也没有深度的教育实践。超越犬儒主义之要津在于重塑精神生活的价值。公共生活、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是现代教育哲学致思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犬儒主义；教育哲学；公共生活；公共理性；公共精神

现代精神生活的困境，一般来说是虚无主义的问题。自尼采（F. W. Nietzsche）借一个疯子之口说“上帝已经死了”之后，一种蔓延的虚无主义，即对普遍价值的不信任、不担当已经成为现代哲学的标志性特

^{*} 高伟，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哲学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教育现代性与教师的教育良知研究”（项目编号：BFA110032）研究成果。

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比虚无主义更极端、更普遍的时代病症。它不仅是哲学的犬儒化，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体制化的犬儒化。在这一意义上，对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的批判就具有对现代教育进行全面整理与反思的特征。现代犬儒主义既是现代教育哲学问题之所在，也是现代教育哲学危机之表征，而走出犬儒主义之要津，就在于重塑精神生活的价值，这是现代教育哲学致思的基本方向。

一、现代犬儒主义：对现代生活的一种症候阅读

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其《犬儒理性批判》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不满情绪表现出一种新的品质，即普遍的、弥散性的犬儒主义。^[1]而当代人对于犬儒主义概念的过分热衷恰恰就是政治建制和政治实践本身出现危机的症候。^[2]现代犬儒主义批判的本质由此是对现代生活品格的精神分析。现代犬儒主义不是一种哲学的生活，而是一种生活的哲学。生活的犬儒主义化才是现代生活品质的问题之所在。现代犬儒主义有别于古典犬儒主义，即小写的犬儒主义（cynic）与大写的犬儒主义（Cynic）之别。这种差别既表现为犬儒主义的历史演进，也表现为现代犬儒主义决定现代生活品质的方式。

（一）作为新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

犬儒主义本身既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也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特征。在古典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那里，对自我的肯定超越了一切解释世界的合法性方式，这种个体存在的“佯狂”承认没有任何权威是神圣的，也没有任何权威本身无懈可击。现代犬儒主义却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式，而且今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这样一种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3]这种意识形态区别于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即不是一种掩饰事物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社会现实的幻象。正是在这一点上，古典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表现出了根本的区别：“大犬儒主义代表着以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对官方文化的通俗化、鄙俗化拒绝；经典的犬儒程序，就是以日常的平凡朴实，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拥有神圣、低沉的音调，并将其提高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用语下面的由权力派生出来

的自我利益、好勇斗狠和野蛮残忍。”而小犬儒主义正好相反：“它承认也重视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的特定利益，承认也重视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它总能找到保留那个面具的理由。”^[3]与古典犬儒主义相比，现代犬儒主义缺乏公开藐视政治权威的勇气，委曲求全，得过且过；但同时现代犬儒主义又怀疑一切，玩世不恭。现代犬儒主义根本地不是一种理性的批评或者批评的理性，而是宗教般地怀疑一切，乃至怀疑本身。正像徐贲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4]。

齐泽克（Slavoj Zizek）认为作为新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有政治犬儒主义和消费犬儒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犬儒主义虽然起源不同，但都是乌托邦失效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差异状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中，斯洛特戴克很精妙地指出：“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consciousness）。它是现代化的不幸意识，在它身上，启蒙的努力既成功，又不成功。它在启蒙中学到一些教训，但它并没有，也许也不能将其投入实践。既春风得意，同时又悲惨不堪，这种意识不再受意识形态批判的影响，它的虚假性已经反思地受到了保护。”^[1]斯洛特戴克认为，作为对虚假意识的批判的启蒙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不仅没有真正战胜虚假意识，反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被虚假意识再次吞没，而现代犬儒主义正是这种虚假意识的现代化。现代犬儒主义所提供的这种后批判的启蒙意识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当启蒙的批判经历了一切之后，它最终把目标瞄向批判自身。相信真理、相信德性、相信生活的本真性仍然停留在天真幼稚的前启蒙状态；而一旦我们看破红尘，就只能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也正是在这里，现代犬儒主义才与其他意识形态判然有别：批判是犬儒主义的条件，而犬儒主义又终结了批判；能够批判的人才会变成犬儒，而变成犬儒便无需批判。

犬儒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在意识形态面具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但他依然坚守这个面具。因此现代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某种悖论性质，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知道得很清楚，也已经意识到隐藏在意识形态的普

遍性背后的不过是为了欺骗和使权力关系具有合法性的上层建筑，但他们仍然没有抛弃这个意识形态。也正是由于这一悖论，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哑然失效。

（二）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犬儒主义

在古典犬儒主义叙事最为经典的《名哲言行录》中，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ēs Laertios）辩护说：犬儒主义“为一种哲学，而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5]。黑格尔（G. W. F. Hegel）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犬儒主义的意义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哲学”^[6]，“犬儒派没有什么哲学教养，也没有使他们的学说成为一个系统，一门科学”，所以，“关于这个学派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好讲”^[6]。犬儒主义一般来说是指发端于公元前4世纪终于罗马时代的一个哲学流派，有一系列哲学家和对个人生活普遍标准的哲学定向。但与作为严格的“哲学”相比，犬儒主义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如像古典犬儒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将需要限定在最少的自然需求上，以嘲笑浮夸的哲学和社会风气为乐事，以行动而非理论向世人布道。20世纪80年代，斯洛特戴克和福柯（Michel Foucault）不约而同地转向犬儒主义研究，其原因也在于他们将犬儒主义视为一种“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全新方式——一种言说真理的自由和担当。古典犬儒主义是某种理想主义的东西，现代犬儒主义则是某种理想幻灭之后的产物。作为一种虚假的启蒙意识，现代犬儒主义反冲性地从根据自然的自足生活转向最现实、最彻底的犬儒拜物教。因此，现代犬儒主义者也才被认为是毫无原则地蔑视一切观念的人，一个盲目追求私人利益的虚无主义者。

纳维亚（Luis E. Navia）认为，与古典犬儒主义基于一套伦理和道德信仰不同的是，现代犬儒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弥散的道德虚无主义和利己主义，它是一个缺失所有人类抱负和向往的社会现象。^[7]古典犬儒主义是某种理想主义的东西，现代犬儒主义则是某种理想幻灭的对冲物。现代犬儒主义正是源于20世纪60年代大反抗运动失败的幻灭感。当理想破灭，生活无望，从有信念的政治走向实然世界的欲望就顺理成章，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双重性相互转化”的正是“神马都是浮云”

的集体狂欢，高贵的低俗化，低俗的高贵化，理想的世俗化，世俗的理想化，一切都被拉平。巴赫金（Бахтин）将这种“降格”了的大众化狂欢称之为“怪诞的现实主义”^[8]。齐泽克指出，支撑犬儒主义物化生活方式的不是对现实的幻象，而是越过人的意识的快感和恐惧。现代犬儒主义者一方面瓦解和调侃一切思想权威，另一方面又刻意回避实际的、现实的权威。这种所谓怪诞的现实主义说到底也就是最现代的现实主义。

犬儒主义双重性相互转化的结果是最终走向消费和市场。斯洛特戴克认为，启蒙的虚假意识是一种新的物化意识。在这种态度中人们并未受骗，相反，它知道自己不带幻想，然而又自觉地卷入“物的权力”之中，充当物的权力游戏的中介。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犬儒主义在消费社会中兴起的根本原因所在。首先，消费社会为犬儒主义提供了欲望生产的社会基础。正像鲍曼（Zygmunt Bauman）所指出的那样，“消费社会和消费主义不是关于需要满足的，甚至不是更崇高的认同需要，或适度的自信。消费活动的灵魂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更不是一系列固定的需要，而是一系列的欲望——这是一个更加易逝的和短命的、无法理解的和反复无常的、本质上没有所指的现象；这是一个自我产生和自我永恒的动机，以至于它不需要找一个目标或原因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或者进行辩解”^[9]。其次，消费社会的精神品格与犬儒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消费的普遍化过程中，再也没有灵魂、影子、复制品、镜像。再也没有存在之矛盾，也没有存在和表象的或然判断……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的：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10]。最后，消费社会与权力关系的共谋也使犬儒主义的产生势在必然。当政治过程抽离了理想和信念等内在品质成为供求关系支配的消费对象时，社会成员也就被缩减为消费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与意识形态的决裂变成合作，与社会生活现实不再严肃地打交道，从而变成顺从的材料。

（三）作为一种实践话语的犬儒主义

现代犬儒主义无疑是一种虚无主义，但却是更彻底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本身是具有反思性的，犬儒主义则是反讽和自欺性的。犬儒主义当然

也有其理性，但这种理性恰恰是对理性的虚无化。因此作为一种实践话语的犬儒主义，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一种对虚无主义的虚无化解构，或者是一种没有深渊的虚无主义。也正是出于这一点，犬儒主义才构成了后现代政治话语的病理学特征。

犬儒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个体与社会的某种关系。黑格尔指出，犬儒主义者是回到他的主观性中，即“以直接对于我具有普遍性的形式的个别性为本质”，也就是说，“把我作为一个对一切个别性漠不关心的、自由的意识”^[6]。但现代犬儒主义的主观性恰恰是对主观性的消解。在《犬儒理性批判》中，斯洛特戴克把犬儒理性理解为“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即为了自我保存，启蒙理性必须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二元关系，把理智理解为征服他者保全自己的工具。但是，当启蒙意识面对无法克服的力量时，它就从攻击性的自我保存转向防御性的自我保存。如果说启蒙理性是自我对他者的同化，犬儒理性则自觉地接受了他者对自己的同化。在犬儒主义那里，正直、诚实被想象为不诚实的最高形式，道德被想象为放荡不羁的最高形式，真理被想象为谎言的最高形式，因此为了自我保存，我们应该放弃诚实、道德和真理。^[1]现代犬儒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严肃对待，也没有什么值得严肃尊重，他只有走向他的孤独与内在；一旦犬儒主义者走向他的本真性，他就会发现他的本真性其实毫无意义。这样一来，现代犬儒主义者的异化就不仅仅是虚无主义的异化——不仅异化于社会，而且异化于自身。现代犬儒主义的幻灭感首先来自于意识到其自身存在的虚无性，并经此而发现了真正客观标准本质存在的虚无性。黑格尔把这种分裂的意识称为精神的自我异化。在精神自我异化的世界里，如果不否定自身，就不能展开对所处世界的批判，因此为了批判世界，就必须否定自身，而一旦否定了自身，对世界的批判就只能走向它的反面，即接受真实存在的世界。这种自觉自愿的矛盾精神就是现代犬儒主义的“佯狂”，即不仅满足于这种矛盾，而且激进地表达这种异化状态。因此犬儒主义区别于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正是在于“既……又……”的这种矛盾性本质，“他是一个不仅异化于社会而且异化于其主体性的形象”^[2]。

作为实践话语，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心灵结构和一套旨在维护个体合理性的思维策略。在心灵结构上，现代犬儒主义既怀疑社会，也怀疑自身，但这种怀疑却不妨碍他的持续活动，甚至这种持久的怀疑本身构成了他自身的生存策略；在思维策略上，现代犬儒主义者则求助于一种持久的反讽策略，以培养个体审美趣味相对于普通大众的优越感。反讽的本质是拒绝普遍，犬儒主义的多愁善感由此只能表现为冷漠和超然；反讽策略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诡辩机巧，犬儒主义的孤独荒诞由此只能是将自身的缺乏当成普遍。犬儒主义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情感状态而非一种严肃的形而上学或政治哲学。

二、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能量与深度的放逐

犬儒主义并没有其教育哲学。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是指现代教育哲学的犬儒化，它总体表现出犬儒主义的病理学特征。对犬儒主义的教育哲学批判因此是对启蒙时期之后教育哲学的总体性、整体性批判。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放逐了生活的能量和深度，表现出了一种庸俗化、平庸化和颓废化的精神畸形状态，并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精神形式，更重要的是，这种犬儒主义不仅仅是教育的，同时还是生活的和体制的。

（一）有能量而没有深度：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的颓废

颓废是种无思无虑的懒惰状态。这种颓废的教育哲学有能量而没有深度，有手段而没有目的，有理智而没有理性，牺牲深度而求诸于表面，贬低生命而乞灵于技术，从而黜废了教育所具有的一切理想主义的品质，堕落为彻底的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

现代教育哲学“无思”性的本质是将生命交付于技术，拒绝对生命的精神价值的任何思虑。技术的强力意志制造了世界的井然有序，但正是这种井然有序把任何秩序都拉平为千篇一律的制造，从而自始就把一个可能出现秩序和可能从存在而来的承认的领域破坏了。^[11]技术的意志把一切存在者包括自然本身变成了无条件地贯彻意志的材料，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算计行为之中。现代政治科学包括现代极权国家事实上都建立在这种现代技术伦理的基础之上，即如何通过意志能够弄出世界来，以便在

最大限度内认定世界是通过实践而完全能够改变的。^[12]技术化了的教育哲学并非没有自我控制,但这种自我控制只是为了将自身对象化从而将一切纳入其主观性之中;技术化了的教育哲学也并非没有价值取向,但这种价值取向不过是将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现代流行的生命哲学本身也是生命的技术化形式,即生命不外乎是自然生命,教育的伦理意义也不外是对自然生命的保全。

犬儒化了的现代教育的力量是一种技术宰制的力量,其意志是一种强求统一的主观意志,其精神则表现为它的“无精神”,或者说恰恰是对精神力量的剥夺。在犬儒主义的教育实践中,人只是服从于某个外在目的的材料,人的生命形式被降解为自然生命,人是没有精神生命的从属物。犬儒主义的教育哲学为其教育实践所提供的理论辩护恰恰在于精神是排在健康的肉体 and 现实的功利之后的奢侈品或装饰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将精神曲解为智能这种决定性的误解是精神力量被剥夺的主要原因所在,“这种智能就是单纯的理智,它思考,计算和观察那事先给出的事物,它们可能出现的演变以及那随后出现的新事物。这种理智是单纯的才能,是可以训练和批量分配的。这种理智自身驯服于组织化的可能性之下,而整个这回事是与精神格格不入的。所有的文学风格和美学意趣都只不过是曲解为智能的精神的后来产物与变种。纯粹的才智(Nur-Geistreiche)是精神的假象并且掩盖了精神的匮乏”^[13]。对现代教育来说,根本无需追问“人是谁”这一本体论问题。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对象而不是作为“问题”存在的。如果“人”只是一个需要加以塑造的对象,那么以理智上可接受的形式去培养人的理智也就成为教育的必然选择和内在本质。

以苏格拉底(Socrates)为代表的西方经典哲学传统认为未经理性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它意味着人作为必须为其存在提供见证者需要关心自身存在的理由。教育也因此获得其本体论意义,即只有通过教育,人才知道何处需要证明、何处不需要证明,也就是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人只有通过教育才成为一个人。而对犬儒主义者来说,生活就是活着,既然生活中的一切规范都是可疑的,对生活价值和意义的追问就变

得无关紧要，因此人活着只是一个心灵问题，而不是精神问题。生活唯一不证而明的真理就是活着，在生活的表面就足以发现生活的意义，那么理性就完全可以付诸阙如。这种心灵策略的最大好处正在于既能有效地回避精神世界所必然产生的恐惧，也能有效地避免心灵世界所必然产生的震颤。总之，由于犬儒主义回避一切精神形式才使一切看起来都平淡无奇，天真烂漫，既不高尚也不卑下，既不辉煌也不暗淡。与波德莱尔所宣称的颓废风格不同的是，现代犬儒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厌世情绪，而是将理性和教养推向一种绝对幻灭的状态。犬儒主义的教育哲学也由此表现为缺失精神力量的神经衰弱症候，疲软，慵懒，病态的自以为是，逃避崇高和普遍，超然物外地沾沾自喜。

（二）有深度而没有能量：现代犬儒教育哲学的平庸

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的“无思”还表现在它的平庸上。与颓废的教育哲学不同，平庸的教育哲学将深度置于能量之上，不是躲避崇高而是追求崇高，从而使平庸的生活打上了崇高的烙印，一切都变得貌似崇高起来。这种貌似的高高为平庸的生活提供了合法化基础及其审美化辩护。平庸的教育哲学的生活化和体制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教育目的上以社会经济概念贬低政治生活。在目的论视野的古典传统中，教育与政治的天然关系表现为通过教育活动提升公民德性从而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的能力，一种美好的政治生活从而成为可能。现代教育哲学则颠覆了教育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虽然教育的地位一如既往地同样重要，但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提升公民的德性，或者达成成人之为人的意义，而仅仅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因为国家的福利和政治制度的运作需要教育。现代教育的功能在这一社会机制中昭然若揭。首先社会问题被转化为政治力量，随之而来的是政治问题被认为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解决。教育存在的所有合理性和终极目的就在于创造经济价值。如此一来，政治生活的德性就被“经济冲动力”冲垮并取代了，商业价值变成唯一可欲的价值，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则只不过是建立在这一虚假的意识形态之上。在一个以“商业”为商标的时代里，那些对美好生活来说最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事物都世俗化、商品化了，人变成了贫乏的怪

物,“他们无所不知,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兴趣,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们欢欣鼓舞。经济话语霸权取消了高贵与平庸的差别,从而也就消解了政治的本质:“法律成为权力;忠诚成为算计;真理成为被普遍承认的正确;基督教则成为寂静主义者的集体。广泛的价值观的混乱和混淆是非控制了灵魂。取代善恶区分的是有用和无用间的崇高分别。”^[14]幸福也不再是一个经典的德性伦理学的问题,幸福的目标被换成了对安全和舒适的追求,而这一追求恰恰完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所有这些手段维护的却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完全沉迷于自己的生存之中,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生存的理由;他在实际获得了充分的安全和舒适的同时,也失去了应该做什么的观念”^[15]。泰勒(C. Taylor)将这种经济价值的尺度化所产生的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称为现代性的隐忧。^[16]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则将这种商品交换价值的胜利所带来的固定意义的消失称为“无深度文化”^[17]。后现代主义恰恰把这种无深度文化视为其深度,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平庸之所在。

其次,在教育价值取向上混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是古典政治哲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和根本精神。古典社会范畴比如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共生活的品质都是以之为条件建立起来的。近代启蒙哲学则强化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理性与私人理性之间的对立。在康德看来,公共理性的运用是学问和学术领域的要求,政府活动则落在私人理性范围之内作为人类必然性的命令支配着私人活动。^[18]启蒙哲学的这种现代性冲动所造成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内在矛盾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困境。一方面,古典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因为对私人领域的支配而消逝了;另一方面,私人领域唯有通过受人类必然性支配的公共领域才能获得自由。后者是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前者则是高度政治生活的去政治化。现代性精神本身就是它的自我矛盾状态。现代性对此矛盾的解决诉诸一种犬儒主义的方式,即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同质化,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依然自我矛盾,一方面由于彼此都相同,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另一方面,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相同性却能使人人对于公众的判断怀有几乎无限的信任……当生活在民主

国家的人以个人与周围的所有人比较时，他会自负地觉得自己与每个人都一样平等；而当他环顾周围的同胞全体，拿自己与这个大整体比较时，他又会立即惭愧地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力量微不足道”。其结果则是，“这种原来使他觉得自己在每一个同胞面前都能自主的同一平等，现在把他孤立起来，不能反抗绝大多数人的行动”^[19]。现代性中的社会个体在教育价值取向上由此也必然是一种犬儒主义的选择，即他从不关心自己需要怎样的教育，而是以公众意志作为真理，即俗常所谓的随波逐流。既然大家都这样，那么“我”也就无所选择，只有投身其中。既然教育已经是这个样子，那就听之任之。

最后，在教育伦理上迷恋内在性。教育伦理是判断何为好的教育、何为坏的教育内在尺度。教育伦理并非说教育具有伦理性，而是说只有当教育合乎伦理判断时，才能明证这种教育是正当的和可欲的。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的精明之处在于它从不放弃对教育伦理的追求，并由此而产生对“深度”的崇拜。它之所以过分迷恋内在性正是由于它需要证明其教育理念的合法性。当私人领域被高度政治化，政治话语体系所唤醒和标识着的某种责任意识就成为个体必须承担和接受的“内在倾向”，这种内在倾向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受教育者会以此来构成他内在的自我意识，或者主动地去接受分内的惩罚。受教育者由此放弃了理性判断的责任，逃避到深度崇拜所获得的庄严感之中，以此消解理性的风险。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混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伦理结果，一是逃出自我走向世界，一是逃避世界退守灵魂。然而，当他走向世界时，他成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相对主义者；当他走向内在自我时，他成为了一个事于反讽、玩世不恭的感伤主义者。教育伦理的所谓深度由此也只能是一种虚假的启蒙意识。

（三）既无深度也没有能量：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的无知

现代犬儒主义取向的教育哲学当它追求深度的时候没有能量，当它追求能量的时候又失缺了深度。换言之，这是一种既无深度也无能量的教育哲学。它在教育该做的事情上努力甚少，在教育不该做或不必做的事情上则着力甚多。它的这种本末倒置或南辕北辙恰恰是因为放弃了对“教育何

为”的本真性思虑，而从最现实、最功利的角度去安置教育，这也是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基本的策略。

首先，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以教育目标取代教育目的。教育目标与教育目的的严格区别在于，教育目标是可以消费的，而教育目的则是不可消费的。教育目标越消费越少，而教育目的则不然，我们越是追求教育目的，教育目的就越是对我们产生一种指向性的影响，教育目标则没有这种方向性价值，因为教育目标一旦达成，一个具体的教育目标也就消于无形。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在教育的“诱惑力”方面，尽可能地鼓励人们放弃那些“大而无当”的教育目的，比如做人和德性，而追求触手可及的教育目标，比如升学和就业。它对教育目的的思虑越少，对教育目标的达成就越是不遗余力，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在这里，可见的永远胜过不可见的，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为了现在可以没有未来。由此一种最深刻的无奈和悖论产生了：教育所产生的代价，需要我们一生去偿还。更重要的是，教育目的是生活的，生活不能没有目的，教育的目的即生活的目的，教育目标则是现实的，现实的不一定是生活的。由此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不能通过教育达成他的美好生活，甚至越是受教育，就越是远离美好生活。如果教育不以培养那些利于生活的普遍品质为己任，那么教育就是反生活的。反生活的教育不是教育，这种不是教育的教育，反倒是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所追求的教育。

其次，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以现实性取代可能性。教育是一项面向可能性的事业，只有“人”这种拥有可能性的存在才需要教育，阿伦特（Hannah Arendt）很精妙地将这种教育的本质概括为“诞生性”（natality）。^[20]教育的全部荣耀就在于指向可能的美好生活。对坚硬的现实来说，教育所指向的可能之事是不可能的，教育实践只能是可以实现的全部现实性。但对教育来说，“对不可能之事的追求”恰恰是教育的安身立命之所，如果失去了这一朴素信仰，它甚至连实现眼前之事的可能也做不到。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正是窒息了教育的可能空间和意义空间，使信念在教育中开启意义的价值彻底枯竭。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由此走向了教育的反面，即为了不失望，最好没有希望。既然世界已经蠢陋不堪，那么就让我